



澳大利亚的艺术治疗中心为心理障碍者提供了完备的绘画、摄影、音乐等设施

迟到的对话

南京艺术家郭海平让世界看到中国精神病人艺术

“他们在被呵护着”

刚结束在常州某精神病院的艺术实验，郭海平就受到了主办方的邀请。该研讨会的主题是“通过艺术促进亚太地区的精神卫生”。

主办方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精神卫生中心与中国卫生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等都有长期的合作。

在澳洲的五天时间里，郭海平和与会的亚太区各国卫生部官员、医学专家和艺术家们，一起实地探访了当地的艺术治疗中心，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他。

设在废弃教堂里的STABLES艺术空间，是一家以艺术手段治疗心理障碍者的非营利性专业机构。教堂面积有数千平方米，分为创作区和展览区。创作区有可供数十人同时使用的大创作室，也有供病人单独使用的独立工作室。

中心提供的创作材料非常丰富，丙烯、油画、水彩等绘画材料，摄影和音乐器材一应俱全，甚至配备了烧制陶瓷的电窑，还有宽敞洁净的电脑房和图书室供病人使用。很多志愿者和艺术家在这里给病人提供指导。

一位女病人的作品吸引住了郭海平。这是一件用各种漂亮首饰、纽扣、挂件拼凑起来的装置作品。女病人告诉他，所有材料都来源于社会捐赠，有一个人把几十年收集到的这些小玩意儿都贡献出来。作品不新奇，但深深打动了郭海平。

“跟她交流，感觉到她的精神状态特别轻松，有种被呵护的感觉，他们很悠闲自得，而且是得到特别优待的群体。跟我们恰好相反。”郭海平说。

郭海平在墨尔本参观了三家不同类型的治疗中心，无论是政府全额拨款或是民间集资创办的机构，资金都相当充裕，而且每家机构都有很多病人排队等待进入，因为病人只要不离开，就没有空缺。

“精神病人重返社区是个难题，建立艺术工作室是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手段，是得到普遍证明的一种方式，也被广大精神病人接受。因为这样做特别尊重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精神病人的性格得到充分尊重，社会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中心只有4人入住

跟澳大利亚艺术治疗中心病人

排队等待入住的状况不同，南京江心洲上的原形艺术中心，迄今为止仅入住过四个病人。郭海平在会上展出了这几个病人的作品。

生于1962年的李辉(化名)在患精神分裂症前是在银行工作。患上精神分裂症后，他离婚两次，现在失业。2010年，李辉读到关于南京原形艺术中心的报道。他告诉郭海平，自己不顾家人的反对在家作画了很多年。郭海平帮助李辉创造了作画环境。三个月前，李辉再婚，新娘非常理解并支持他画画。虽然李辉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有一间画室，但是他的新房子是一个十平米的房间，连画画的桌子都摆不下。

自己的作品《幻想》在大会上展出，李辉并没有所谓的成就感。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我反对有这种思想，带来妄想和妄自尊大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我克服很久才克服掉的”，“画画是为了治疗自己心理的疾病，人的那种浮躁状态。画画让我安静下来，并认识到自己。”

小海是一个来自海南的15岁患者。擅长画任意视角的交通工具，而且非常精确。出乎郭海平预料的是，作为典型自闭症患者的小海竟然时常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小海在中心住了一个月，共画了六七幅不同的“喝酒开车是杀手”、“抽二手烟有害”之类作品。一幅是大酒瓶站立，有个管子对准车，烈酒顺着管子进入车体。还有一幅是，大酒瓶倒在地上，汽车玻璃全部碎裂，画面感自然，其表现力在自闭症天才画家中极为少见。小海的妈妈说，小海平时非常吵闹，唯一镇定时就是画画。

今年7月，湖南卫视“帮助微力量”栏目播出了《遥远星球的孩子》，讲述的就是小海的故事。

电视直播中展示的一幅画作，是一辆打开车门的小轿车，车上坐着一位妇女和一个男孩，王海起的名字叫《我与妈妈》。另一幅没有展示的画作，是一个男孩骑车，后面坐着一位妇女，王海命名为《小海带妈妈》。两幅画展现了感人的母子之情。小海刚出生时就被抛弃，养母为了给他看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弄出了一身的病。为了满足小海的绘画需求，母亲天天去捡废纸给他画画。节目播出后，现场募集到善款20万元。

精神病人的艺术治疗，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在这道社会屏障上，郭海平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重返社区的障碍

“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也深感中国在这块工作的保守与落后。”同行的卫生部精神卫生处的官员参观后感慨道。

据了解，目前中国精神卫生的改革模式，就是参照澳大利亚墨尔本模式进行的。过去的十年，中国的社区心理卫生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也开始倡导精神病人重返社区，但实施起来却很难。

“比如说，精神病人住院隔离时间最长不超过10天，主要康复计划在社区完成。但讲起来容易，由于配套设施的缺乏和相关理念的滞后，使得病人根本无法重返，不得不呆在精神病院里面。”郭海平说。

在南京就有六七家由政府出资创建的社区庇护中心，比如鼓楼区凤凰托养中心、博爱安养庇护中心等等，服务对象90%是自闭症和智障患者。大部分精神病人并不愿意到这些机构寻求帮助，因此精神病人大部分重返社区还是个难题。

“不愿意去。很多人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精神病院，进去意味着自己给自己重新贴上标签。这是因为我们的医院跟发达国家不太一样，他们是治疗和保护的场所，而我们的治疗手段相对简单粗暴，除了吃药就是隔离、限制自由。像法国的精神病院都是开放式的，病人可以自由进出，病人进去是进入到一个保护空间，而我们一进去就意味着自由被剥夺。”

在郭海平看来，精神病人重返社区主要存在两大障碍。

一是生物医学模式主宰。对待精神病人普遍忽略他们的精神属性，过度强调生物医学的治疗，忽略社会文化因素的干预。文化艺术手段的介入也仅停留在最简单的娱乐水平，至于如何充分发挥艺术的作用，如借助艺术深入到病人心灵深处，并为病人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自由表达内心世界的语言，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们对此恐怕并未做好相应的知识准备。“我与许多重度精神病患者交流过，几乎没有病人满意医学治疗，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对立情绪，与西方70%以上的精神病人主动要求住院不同，中国70%以上的病人都是被强制送进医院的。”

二是法律的缺失。“因为没有精神卫生法的保护，大多数中国精神病人在医院里至今仍无权携带一支铅笔。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很多住院病人对他人和自己并不构成伤

害，而且完全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但由于监护人不愿为他们办理出院手续，致使他们不得不永久住在精神病院内，直至死亡。”因为自己的长兄也是精神病人，郭海平对此有深切的感受。

精神卫生法明年或颁布

“很多人都想介入心理障碍者的艺术治疗，但因为跨学科，介入非常困难。懂艺术的不懂医学，懂医学的不懂艺术。”郭海平说。

东南大学医学人文系主任何仑就是一位介入者，他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在他看来，像澳大利亚那样人性化的艺术治疗中心，国内根本就不存在。长期的被无视和被歧视，使得精神病人重返社会只是句空话，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法律保障。“精神卫生法的建立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医学水平和法律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待人精神的基本价值判断，没有这样的价值判断，所有文化都会因此相互消解。”他说。

而据同行的卫生部精神卫生处官员透露，精神卫生法明年可能会颁布。

今年10月24日，起草历时26年的精神卫生法草案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共7章76条，涉及精神障碍预防、诊断和治疗、康复、保障、法律责任等内容。

卫生部部长陈竺坦陈当前精神卫生存在的三大问题，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水平偏低、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时有发生，以及因强制收治程序缺失导致出现一些“被精神病”事件。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尚未制定精神卫生法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世卫组织成员国都有保护精神病人权益的精神卫生法，其中欧洲已有96%的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精神卫生法，西太平洋地区仅有中国大陆、老挝和马绍尔群岛尚未颁布精神卫生法。

社科院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认为，精神卫生法本质上是人权保障法。“这种法律最开始主要是治安功能，后来又有救治功能，再后来就是国家如何支持精神卫生，怎样保护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的权利、防止正常人被关进去变成病人和正常人共同的人权保护法。”

“希望艺术界、医学界都能正视精神病人，不带偏见地看待非理性的姿态。给非理性、疯癫者一个平台、一个平等的机会。”郭海平说。



一位病人的画作



设在废弃教堂里的STABLES艺术空间